

莱布尼茨与中国

——《中国近事》发表300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李文潮 编
H.波塞尔

科学出版社

本书由中德科学中心资助出版

莱布尼茨与中国

——《中国近事》发表 300 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李文潮 H. 波塞尔 编

李文潮 等译

科学出版社

2002

内 容 简 介

1697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 W. Leibniz, 1646~1716)发表《中国近事》一书。1997年10月,在柏林召开了有关这本书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从中国、日本到美国,从中美洲、俄罗斯到德国,几乎所有研究莱布尼茨与中国的专家学者都参加了会议。本书是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内容包括《中国近事》的背景,莱布尼茨与在华传教士的关系,莱布尼茨对中国社会和中西文化交流、对《易经》和儒家思想的看法,以及《中国近事》的影响。本书适于哲学工作者、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者及大学师生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莱布尼茨与中国/李文潮等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ISBN 7-03-009884-6

I. 莱… II. 李… III. 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IV.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7950号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网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2年2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0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3 3/4
印数:1—500 字数:471 000

定价: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译者的话

本书原版于2000年5月问世，现在中文版就要与读者见面了。这得益于在北京的中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的鼎力支持。编者在此表示感谢，并预祝中德中心在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科学进步及相互了解方面做出贡献，取得成功。

书的缘起，原版前言中已经提到，不再赘述。这里就翻译一事，做几点说明，然后谢谢玉成其事的诸位同仁及朋友。

本书收集的文章中，中国大陆的几位作者、美国的成中英先生、加拿大的陈荣灼先生和我自己提供了各自论文的中文稿，其余文章均是直接从原文翻译的。英语文章的翻译者是黑龙江商学院的潘尔艳副教授、来自台湾的柏林工大哲学系博士生张静女士以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田淼博士；惟一的一篇用法语写成的文章是请西安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的两名研究生项颐小姐与李侠小姐翻译的。我自己翻译了用德语写成的文章，并对全书进行了统一校对。对原版中存在的个别明显错误，借机做了更正，未一一标出。

莱布尼茨研究中所使用的缩写，已成“国际惯例”，译文中照搬。缩写表见书尾文献部分。

为了方便读者查阅，文章中使用的文献，一般情况下在括号中译出书名大意，注释中的作者名及出版地名不译。

翻译属于“服务行业”，是件不容易，有时甚至“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学术论文的翻译更是如此。好在书中的作者们，除一人以外，全都健在。征得他们的同意，中文版中加入了作者介绍作为附录。读者如有疑难之处，或有意见批评，均可与作者直接联系。编者亦愿搭桥引线。通过互相商榷，译文中的不确之处或可部分地得到消除。

出门在外，这些年得益于不少同事特别是朋友们的帮助。这本书亦是如此。首先感谢我的师长汉斯·波塞尔（Hans Poser）先生。他是研究莱布尼茨的“大家”，多年来对“莱布尼茨与中国”这个题目怀有极大兴趣，亦是原版书的编者之一，是他为我找到了这份“差事”；还要感谢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档案馆的赫尔伯特·布雷格（Herbert Breger）教授，他一直关注着本书中文版的编译进展，并尽一切可能提供了不少帮助；最后感谢德国 Franz Steiner 出版社的托马斯·沙博尔（Thomas Schaber）博士，他非常高兴地提供了本书的中文版权，其要求仅仅是送他两本自己“读不懂”的样书。

李文潮

2000年8月初稿于德国柏林

2001年8月定稿于西安外院

原版前言

“Je ferai donc mettre une affiche à ma porte avec ces mots: bureau d'adresse pour la Chine, afin que chacun sache, qu'on n'a s'adresser à moy pour en apprendre des nouvelles.”——上面这段话摘自莱布尼茨 1697 年 12 月 14 日写给在柏林的选帝侯夫人索菲·夏洛蒂的一封信¹。大意是：莱布尼茨准备在自己的办公室的门上挂个牌子，写上“中国事务处”几个字。凡是涉及到有关中国的问题，均可先寄给他，再由他转给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字里行间，写信人显得自豪，也有点自嘲，当然更知道自己在精神界的地位与影响。

写这封信的半年前，莱布尼茨编辑发表了《中国近事》（亦可译《中国近况》或《中国最新消息》），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唤起新教教派同样加入在中国传教的行列。再过不久，布兰登堡科学院就要成立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将被正式列入科学院的章程之中。将柏林作为活动的基地，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原因：安德烈·米勒（Andreas Müller）生前是这里的尼古拉大教堂的教长，他曾受布兰登堡选帝侯的委托，收集有关中国的书籍与报道，对中国文字亦有研究，曾声称自己发现了掌握中国文字的“钥匙”，只是秘而不宣，后来竟将多年心血付之一炬。米勒死后，对中国文字同样颇有兴趣的克里斯蒂安·门采尔（Christian Mentzel）接管了他的图书管理工作。收集到的图书供莱布尼茨一类的学问家使用。《中国近事》初版于 1697 年，两年后再版。我们在柏林纪念这本小册子发表 300 周年，自然有其地理环境上的原因。

在探讨欧洲对中国的诠释与看法时，我们这次从莱布尼茨开始，更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内容方面的：与那些所有的对中国的“兴趣”相比，他的兴趣最广泛，似乎亦更深入。莱布尼茨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中国的文字与语言，亦包括中国的科学与技术，更有这个国家的体制与状态，还有他所称道的儒家哲学。一直刮到“洛克”（Rokoko）时代的中国风只是个时髦现象，“追风”者似乎从未想过“了解”中国，更不用说“理解”了；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受过良好的科学教育，但他们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传教；作为科学家，他们与莱布尼茨有共同的兴趣，作为传教士，他们觉得莱布尼茨提出的问题是“干扰”；欧洲不少人对中国感兴趣，但他们的眼睛里看到的只是一个方面、一个问题。只有莱布尼茨一人试图“全面”了解这个古老的国度

1 A I, XIV, 869.

与文化，他涉及到了上面提到的所有范围，同时又力争将它们综合起来。还有，莱布尼茨是个“向远处看”的人：西方文化以科学理论见长，当然还有它的基督教“天启真理”；中国文化注重实用技术、经验总结，当然还有莱布尼茨称为“自然神学”的儒家哲理。从地理位置来看，俄国正好位于中国与欧洲之间，正好起着中介传递的作用。在莱布尼茨看来，中国皇帝（指康熙）宽宏大度、允许耶稣会士自由传教；在与俄国的大小战争中自己虽然是强者，却愿意与对方签署和平协议（指尼布楚条约）；为了皇家的利益，日夜学习数学与天文。这样的一个统治者在莱布尼茨看来既是理想又是一面镜子。在当时的欧洲，不是有个皇帝（指路易十四），武力侵犯他国，单方面地解除了已有的南特宗教敕令，将自己的个人独裁统治看作比莱布尼茨奉为政治外交宗旨的理性和谐更重要吗？

莱布尼茨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文化的看法当然非常理想化，以后的历史现实已经无情地修正了他的想像。这是事实，但不是关键。关键是莱布尼茨表现出来的精神：尽一切可能，理解一个不同文化的自身价值即不同之处，在政治以及日常行动中坚持以理性为准绳，宽容地对待其他文化与思维。这一切，似乎是我们今天还值得发掘与保存的，不仅出于历史的原因。学术讨论会是1997年10月4日~7日在柏林召开的，亦是有关这本书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从中国、日本到美国，从中美洲、俄罗斯到德国，几乎所有研究莱布尼茨与中国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格尔达·乌特米勒女士（Dr. Gerda Utermöhlen）在提交了论文初稿后身患重病，短暂的痛苦后与我们永别了。几十年来，她一直在下萨克森州图书馆从事《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科学院版的编辑工作，最后几年整理的恰恰是《中国近事》这段时间内的文献与资料。这本书收入了她的最后一篇论文，同时作为对她的纪念。还有，柏林夏洛蒂宫博物馆原馆长玛格勒特·库恩女士（Dr. Margarethe Kühn）生前一直注意研究莱布尼茨与中国的关系，收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库恩教授1996年高龄仙逝，但她的精神还在宫殿里活着。今天在任的贝尔教授（Winfried Baer）曾协助库恩举办过《欧洲与中国》的展览。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战争中被破坏的中国瓷器馆已经差不多补齐了。这些当然不是这本集子所要讨论的问题，但它们也许反映了一点会议召开的背景。

书中共收集了20多篇文章，其中罗丙内（André Robinet）先生、陈乐民先生以及珀金斯（Franklin Perkins）先生未能与会，论文是后来收入的。由于《莱布尼茨文集》科学院版不易得到，有几位作者只好在他们的文章中引用了其他版本。编者在必要的地方，标出了标准版本中的出处，以便读者查询。

至于本书涉及到的丰富内容，没有在这里进行归纳总结，读者只要翻翻目录就知道了。不过既然很多专家都到会了，论文也要面世了，我们还是想借这

个机会对未来的工作做个展望，因为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

在莱布尼茨的著作中，提到或者涉及中国的地方很多。莱布尼茨是怎样具体地即通过何种渠道接触到中国哲学的，这还是个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探讨这个问题，将会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评价中国哲学在莱布尼茨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此便有必要非常系统地整理一下能够找到的这方面的全部资料，特别是书信中涉及到中国的段落。

尽管已有几个单行本问世，特别是书信方面的，但就几篇非常重要的论文而言，我们至今还没有符合科学研究要求的校正本。这几篇论文是《中国近事》、《论尊孔》以及《中国自然神学论》等等。

中国学者可以进一步研究一下，耶稣会士使用过哪些拉丁文及汉文著作，其中哪些被保存下来了？这样便可进一步确定东西方文化在那段时间的具体交流及互译情况。一个非常具体，也很重要的课题是：当年闵明我返回中国时，莱布尼茨曾交给他 30 个有关中国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闵明我也许做了答复或者起码做了答复的准备。假如做了答复，是否寄回了欧洲？

还有，耶稣会士，特别是龙华民与白晋，在接受中国文化时受到了中国传统中哪一学派的影响？对于研究莱布尼茨的《中国自然神学论》以及详细分析莱布尼茨在这篇文章中对宋明理学的许多具体解释，这一点非常重要。

以上提到的均是精神史方面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怎样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探讨一下在多大程度上莱布尼茨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在他对中国的看法中哪些有待我们修改更正？还有，在 18 世纪中，欧洲不但对莱布尼茨，而且还继续对中国感兴趣。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莱布尼茨被遗忘了，中国也被欧洲遗忘了，其原因是什么？今天的情况似乎相反。莱布尼茨被重新发现了，中国亦再一次受到欧洲的关注。

有待研究的课题是多方面的，亦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既需要与中国学者的进一步合作，也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能够唤起中外学者研究以上问题的兴趣。为了人类的进步，为了文化之间的共存与交流，希望我们携起手来，再次架起一座桥梁。

学术研讨会已经召开了，论文也要出版了。我们借此机会，再次向支持会议召开以及论文出版的单位与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是：德意志科学研究联合会（DFG），柏林市政府，汉诺威莱布尼茨协会（G.W.Leibniz-Gesellschaft Hannover e.V.），普鲁斯宫殿与公园基金会，柏林工业大学校长，柏林工大哲学系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室，雷文道斯基小姐（Alexandra Lewendoski）。

编者

目 录

译者的话

原版前言

第一章 《中国近事》的背景 (1)

汉斯·波塞尔 (Hans Poser, 德国)

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与欧洲对中国的兴趣..... (1)

丽塔·威德迈尔 (Rita Widmaier, 德国)

《中国近事》的目的与意图 (19)

孟德卫 (David E. Mungello, 美国)

在莱布尼茨的哲学中中国到底有多重要? (45)

第二章 莱布尼茨与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56)

克劳斯·莎茨 (Klaus Schatz, 耶稣会神父, 德国)

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文化选择..... (56)

安德烈·罗丙内 (André Robinet, 法国)

莱布尼茨与闵明我在罗马的会面..... (66)

克劳德亚·冯·柯兰尼 (Claudia von Collani, 德国)

莱布尼茨与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75)

第三章 《易经》与通用字符 (90)

汉斯·海因茨·赫尔茨 (Hans Heinz Holz, 瑞士)

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待通用字符与《易经》..... (90)

丹尼尔·库克 (Daniel J. Cook, 美国) 罗思慕 (Henry Rosemont Jr., 美国)

莱布尼茨、白晋、远古神学及《易经》 (108)

成中英 (美国)

莱布尼茨的通用符号系统概念与《易经》写征实在论..... (121)

施忠连 (中国)

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邵雍的先天图..... (145)

郝刘祥 (中国)

莱布尼茨的通用字符理想..... (150)

陈乐民 (中国)

莱布尼茨和“儒学” (169)

第四章 莱布尼茨对儒家的诠释·····	(176)
谢和耐 (Jacques Gernet, 法国)	
莱布尼茨与龙华民论“理”·····	(176)
陈荣灼 (Wing-cheuk Chan, 加拿大)	
莱布尼茨与中国的自然哲学·····	(182)
华林三口 (日本)	
从当代的角度评价莱布尼茨对宋明理学的诠释·····	(194)
第五章 莱布尼茨的世界普遍和谐与《中国近事》·····	(207)
帕特利克·瑞利 (Patrick Riley, 美国)	
《中国近事》体现的莱布尼茨的政治及道德哲学·····	(207)
酒井 洁 (日本)	
莱布尼茨的“中国学”与“类比原理”·····	(226)
富兰克林·珀金斯 (Franklin Perkins, 美国)	
《中国近事》中比较哲学的理论基础·····	(240)
弗拉基米尔·卡塔索诺夫 (Vladimir Katasonov, 俄国)	
传教活动与莱布尼茨哲学·····	(257)
维快 (Welf H. Schnell, 德国)	
期望与现实——通过《中国近事》观察莱布尼茨的宇宙和谐·····	(266)
第六章 《中国近事》的影响·····	(272)
格尔达·乌特米勒 (Gerda Utermöhlen, 德国)	
《中国近事》在哈勒虔敬主义范围内引起的反响·····	(272)
李文潮 (德国)	
“自然神学”问题——莱布尼茨与沃尔夫·····	(280)
哈特姆特·鲁道尔夫 (Hartmut Rudolph, 德国)	
从教会史的角度看莱布尼茨与在华的传教活动·····	(292)
夏瑞春 (Adrian Hsia, 加拿大)	
莱布尼茨及韦伯的 Chinesien·····	(305)
殷登祥 (中国)	
莱布尼茨研究在中国·····	(318)
附录·····	(326)
插图·····	(326)
文献·····	(331)
人名索引·····	(353)
作者简介·····	(363)

第一章 《中国近事》的背景

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与欧洲对中国的兴趣

汉斯·波塞尔 (Hans Poser)

(德国)

17 世纪欧洲文化方面最伟大的发现是认识了中国，发现了一种与西方旗鼓相当的文化，一个高度发达而又陌生的帝国。美洲的发现曾给欧洲带来巨大财富，中国的发现同样将给欧洲带来财富，不过与金银不同，这种财富可以传到世界各地同样发挥作用，而在自己的发源地却不会随着外传而日益减少。这一财富的特点决定了：从一开始对中国的发现便是对文化的发现。如同孟德卫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新的世界是个“神奇的国度”¹。原因是多种的，不单是对陌生事物的好奇。具体到莱布尼茨，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这些原因。

I 《中国近事》

17 世纪初，中国成为欧洲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了欧洲人的兴趣所在，不仅在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文化方面。准确一点讲，指的是艺术、宗教、科学技术以及伦理道德。中国的丝绸、漆器、陶瓷、贴墙纸以及精美的青铜器展示了非常高超的工艺品位，受到了欧洲人的赞赏，成为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与当年马可·波罗那种神话般的描述引起的反响差不多，耶稣会士们对中国报道吸引了大量读者²。由门多萨编辑的《中国游记》从 1585 年到 1663 年先后再版 28 次，被译成七国文字³；利玛窦的《中国札记》1615 年出版后，30 年间再版 12 次，被译为六国文字⁴；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 年初版，到 1678 年已再版 9 次，被译为五种文字⁵，卫匡国 (Martino Martini) 关于满清人占领中国的《鞑靼战纪》1654 年初版，到 1706 年已出版 21 次，被译为九种文字⁶。以卫匡国收集的材料为基础，布劳恩 (Joan Blaeu) 于 1665 年编辑出版了装潢精美的《中国新地图》⁷，包括 17 张地图，200 多页文字说明。

这份地图同时以多种文字出版，其中的德语版是献给德国布朗施威格公爵乌尔利希 (Ulrich) 的，此人是安东·乌尔利希的父亲，莱布尼茨后来成为安东·乌尔利希的图书管理员。除这些现场报道外，还有无数个以此为基础的二手文献。一句话，“当莱布尼茨慢慢地进入当时的精神世界时，中国已成为欧洲的日常话题”⁸。

17 世纪中，欧洲对中国的了解愈来愈多，尽管在整体上还显得有点东拼西凑，但无论如何也是一块一块地积攒起来的，与单纯的“猎奇”完全不同：对于这个泱泱大国的地理，对于中国的政府管理、风俗人情、建筑与医药均已有了相当详细的文献描述。尽管如此，这只是些“副产品”，欧洲的眼光主要聚集在对中国的传教事务上。在这方面又有几点非常引人注目，一是利玛窦的发现，认为在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中保存了人们对上帝的认识，而这一认识后来被人遗忘了，按照这一看法，传教的关键便与考古相似，任务是将被岁月掩藏了的古老的认知发掘出来，这样的话，传教便是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传统开始，而中国的文人又是非常熟悉这一传统的。这就是所谓的“利玛窦规矩”⁹。当然还包括了基督教适应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及思维方法，只是利氏之后，这一观点受到他的继承人龙华民 (N. Longobardi) 的批判，这便同时拉开了“礼仪之争”的序幕¹⁰。

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的风俗礼仪究竟是属于“政治世俗性，因而是与基督教不相关亦对其无害的”习惯呢——这是利玛窦，也是莱布尼茨的观点——还是属于渎神主义的异神崇拜？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莱布尼茨经常通讯的白晋 (J. Bouvet) 所提出的“象数学”。按照白晋的解释，中国古史中提到的最老的帝王可被看作是《圣经》上所说的洪水暴发之前犹太人的祖先即教父，这样一来，《旧约》所记载的关于上帝的学说便可直接地与中国的上古文献联系起来¹¹。这种解释遭到了中国文人的批判与拒绝¹²。

伴随着传教工作，在 17 世纪中期后，欧洲对中国的兴趣中又增加了两条。这两条均是由莱布尼茨引起的，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是对中国文字的兴趣：是否可以把中国文字解释为一种非常理性的人工文字¹³？白晋后来向莱布尼茨指出的《易经》与莱氏二进制的吻合亦属于此¹⁴。二是对儒家伦理的兴趣：儒家伦理是否就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伦理道德的典范？莱布尼茨指出这一点，并认为中国接近理想的“理性化国家”¹⁵。后来的克里斯蒂安·沃尔夫非常绝对地支持与捍卫了这一观点¹⁶。

以上提到的这些问题莱布尼茨都注意到了，并且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他的看法。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编辑发表《中国近事》之前，莱布尼茨接触中国已达数十年，如威特迈耶 (Widmaier) 女士指出的那样，莱布尼茨在 1666 年发表的《组论》(Ars combinatoria)¹⁷中便引用了基歇尔《埃及埃提巴斯》中有

关中国文字的章节¹⁸，提到了当时刚出版的图文并茂的《中国图说》。去巴黎（1672）之前，莱布尼茨便阅读了有关这个远方文化民族的著作。美因茨公侯区首席大臣博内布格（Boineburg）的私人图书馆里收藏有斯皮则的《中国文献注释》以及其他关于中国的著作¹⁹。也许是受博内布格的指点，莱布尼茨开始与斯皮则通信，在其中的一封信中莱布尼茨提到了刚刚出版的聂仲迁的《中国历史》²⁰，还提到“另外一本类似的法文书”²¹。能收集到的他几乎全读了，因此在莱布尼茨的著作及书信中，经常出现与中国有关的话题。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毫无疑问是莱布尼茨认识了闵明我（Philipp Grimaldi）。1689年，当莱布尼茨来到罗马时，闵明我在其返欧途中恰好在此逗留。莱布尼茨本人并不懂汉语，但这层关系使他日后能够直接得到所希望知道的有关中国的消息²²。

正是和耶稣会士们的接触，使莱布尼茨能够在1697年4月编辑出版《中国近事》，并且加上自己的序言或者说编者按。这本书的副标题很有点巴洛克味，因为它很详细，即“发表中国近事是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书中收集了许多至今鲜为人知的消息：一份传到欧洲的中国官方首次允许基督教传播的文件，另外还有一份叙述欧洲科学在中国的声望及对汉民族的风俗习惯的看法，特别是对当朝皇上的赞扬，最后还有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战争，以及他们所达成的协议”²³。

除了莱布尼茨自己的前言，此书确实收入了当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来自传教士们手中的中国“最新消息”：苏霖神父（Jose Soares）的《一六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奉旨准许传教自由记》即康熙皇帝允许传教的御批；南怀仁神父（Ferdinand Verbiest）《欧洲天文学》的节选，用来说明中国人，特别是皇帝本人对欧洲科学的兴趣；闵明我神父在返回北京的途中在印度果阿写给莱布尼茨的一封信，内容是莱布尼茨交给闵明我的一张单子，上面有他想了解的30个问题；安多神父（Antoine Thomas）写自北京的一封信，叙述北京皇宫支持基督教传播的有关情况；俄罗斯使团访问中国的沿路见闻摘要；最后是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有关中俄和平协议即尼布楚条约的报道。在两年以后的第二版中，从莫斯科赴北京的旅途见闻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特别是收入了白晋颂扬中国皇帝的《康熙大帝传》。

此后的十几年中，莱布尼茨与在中国的耶稣会士特别是白晋保持着广泛的书信往来。直至晚年，莱布尼茨一直关心着中国问题。1714年，尼古拉斯·雷蒙（Nicholas Rémond）写信给莱布尼茨²⁴，告诉他自己看到了1701年在巴黎出版的一本文集，内有龙华民的《关于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以及利安当（Antoine de Sainte Marie）的《关于在中国传教的几个重要事情》。这两篇文章均反对利玛窦的“适应”儒家观点，雷蒙希望莱布尼茨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并将此文集寄到了汉诺威，莱布尼茨答应了这一要求²⁵，写出了他那篇《中国

自然神学论》²⁶，虽然没有脱稿，但仍不失为一篇完整地讨论中国哲学的论文。莱布尼茨死后，这篇文章于 1735 年被首次发表，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莱布尼茨认真研究了龙华民对利玛窦的批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最后以《易经》与二进制的关系结尾。就像麦尔克指出的那样²⁷，这篇文章开辟了欧洲汉学的先河，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完全崭新的领域。直到 19 世纪初，欧洲汉学家才开始依据新的原材料重新对《易经》进行研究。

上面的简单介绍说明，就中国而言，莱布尼茨所涉及到的问题是非常广泛的。我们可以根据重点将其归类，用来评价《中国近事》：开始时是由研究组合论而产生的对中国文字的兴趣，这一兴趣一直延续到对《易经》的二进制解释；第二个范围是希望用中国人积累的大量观察与经验补充以理论为主导的欧洲科学，因为这些可以为莱布尼茨力求建立的通用科学提供经验基础；第三点涉及到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认识闵明我后，这一直是莱布尼茨关心的事情，单从外表看，亦是发表《中国近事》的直接起因。由此产生了第四个范围，即中国哲学。第四个问题与第三个直接相关，其结果便是致雷蒙 (N. Rémond) 的长信即《中国自然神学论》。我们在下面以这几个范围为导向，阐明莱布尼茨的兴趣所在，然后在末尾将莱布尼茨对世界的看法综合一下，这一看法构成了《中国近事》的理论背景。

II 《组合论》、中国文字及《易经》

我们从《组合论》开始，探讨一下欧洲由此产生的对中国文字的兴趣。最能代表这一兴趣的，是莱布尼茨 1679 年 6 月 24 日写给埃斯荷尔茨 (Elsholz) 的一封信²⁸。在信中，莱布尼茨提出了几个问题，请埃斯荷尔茨转达给柏林尼古拉大教堂的教长安德勒斯·米勒 (Andreas Müller)。米勒曾声称自己找到了掌握中国文字的“钥匙”，而又不愿意将其公布于世。莱布尼茨提出的所有问题皆围绕着是否真的有这么一把“钥匙” (题 6)，假如有的话，是否可以借助基本符号，如同字母那样 (题 3)，根据符号与所表示的事物之间的一定归类原则表达所有希望得到表达的事情 (题 1)，也就是说，符号与被表达的事物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相似关系 (题 2)。下一组问题是假如确有这种关系存在，中国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题 7)，人们是否能够以这种关系为基础比较理性地把握事物的性质 (题 9)，假如这样的话，是否可以根据事物的本质特点区分事物 (题 10、题 11)。另一组问题涉及到文本的阅读，是否可以排除文本的歧义性，怎样学习这种符号以及是否可以借助这一“钥匙”准确地翻译中国文献 (题 12、13、14)。这里所出现的所有概念均是莱布尼茨符号理论的关键所在，他所关心的是符号的作用方式，亦即符号作为“记号” (signum) 与

“认识”(notio)之间的关系,提出这些问题意在加深对符号理论的探讨。

更加深远的是莱布尼茨对语言比较及语言史研究的设想。在其众多通信中,莱布尼茨一再强调有必要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为了这一点,不仅需要汉语方面的资料亦需要近邻民族的语言文字来作比较。其原因是: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探寻不同民族的‘共同’起源。

很明显,几乎所有我们知道的古老语言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均显示了一定的相似性,好像它们均是从一个共同的源泉发展而来的。当然,假如我们跨洋到美国去,到亚洲及美洲的边缘及遥远地区去考察一下,我们会觉得他们的语言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好像那儿的民族是些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种类似的。然而,如果我们在研究语言时,从一个民族过渡到(与其相近的)另一个民族,而不是跳越,我们便可作出更好的判断。”²⁹

莱布尼茨认为只有在占有足够的资料时才能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准确的语言比较。表面上看,这些属于纯粹的语言学,特别是语言史方面的设想,只是在其背后隐藏着一个在17世纪中经常讨论的问题,即“历史”。自从门多萨的著作发表后,人们认识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如果按照拉丁文《圣经》的算法,中国历史可以上溯到“大洪水暴发”之前,而通过中国史书记载的古天文现象,卫匡国认为中国史书的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情况下便只有两种可能可供选择³⁰:按照拉丁文本的算法,必然得出《圣经》上所记载的洪水只是个局部现象。这一点显然带有异教色彩;另一种可能,是采用《圣经》的古希腊文本,因为古希腊文本中记载的洪水暴发的时间要早一点。莱布尼茨主张选取后者。只是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中国上古时代的英雄帝王是否是人类的始祖诺亚的后裔?中国文字是否真的脱胎于古埃及文字?与古希伯来语比较,这几种文字中的哪一种更古老?对这些问题,人们当时提出了非常大胆的假设。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评价莱布尼茨对语言史的研究:依赖对相近语言中人名及语法的系统比较,可以找出一条出路,通过可以得到检验的陈述取代异想天开的假设。这样对语言文字的单纯观察便成了分析人类历史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手段与工具。提出问题的背景以及解决问题的视野从而变得非常宽广了,这一点很有莱布尼茨特色。

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文字“也许在很大程度上与哲学有关,也许建立在非常理性的基础之上,如数学、秩序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代表的那样”³¹。这一看法与基歇尔及斯皮则对中国的文字解释有关,亦受到了米勒寻找的“钥匙”的启发,但莱布尼茨的解释与他们不同:尽管莱布尼茨不认为中国文字属于简单的象形文字,但他认为从中国文字中也许能找到某种语言结构,如同《易经》所显示的那样,六爻组成的卦被看作中国文字的前身。在1701年11

月4日写给莱布尼茨的信中³²，白晋指出了《易经》中六爻卦与二进制在形式及内容上的吻合，因为《易经》中所使用的符号组合可以用来解释宇宙的形成与变化，因此在这点上亦与莱布尼茨对自己的二进制的要求不谋而合。莱布尼茨认为二进制不仅是个算术问题，而是可以用来形象地表示上帝（即数字1）从虚无（即0）中创造了万物。因此对于白晋的发现，莱布尼茨感到非常惊讶³³，而在莱布尼茨眼中，白晋既熟悉中国传统，又熟悉对《易经》的解释。如萨哈尔指出的那样，白晋认为“六十四卦所组成的系统中包括了所有科学的总原理，而所有卦象均是由一个或数个符号以不断分枝的形式产生而来的。莱布尼茨认为六十四卦与某种哲学符号之间的联系是可能的，白晋认为这种联系就是概念的分支与形成，而概念的分支，又可以还原成二进制，因此二进制与六爻系统是同一的。”³⁴

这样，从本来的形式系统中便产生了莱布尼茨所说的“对上帝的证明”，无论是对白晋还是莱布尼茨，这一“发现”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白晋希望能从《易经》出发诠释《圣经》中的“天启真理”³⁵，莱布尼茨在这方面比白晋小心，他希望从中推导出一种理性的神学，一种适合中国传统的传教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一方式也许能博得中国皇帝的赞赏与欢心：“我发明的新的数学验算方法以非常漂亮的方式描述了上帝的创世过程。基督教中关于上帝创世的信条是非常伟大的，我的主要目的是，以我的方法证明这一信条的正确性。我甚至想，我的证明会引起中国哲学家的极大兴趣，也许皇帝本人也是如此，因为他对数的理论很感兴趣，亦很精通。”³⁶这样，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字的研究便进入了理性宗教范围。

III 知识与科学的交流

在给闵明我以及其他中国传教士的信中，莱布尼茨一再强调，不能单方面地一味给中国人传授欧洲的知识，亦应该同时将中国的知识带到欧洲，使其在这里发挥作用。他写道：

“（耶稣会士们）把我们在数学上的发现介绍给了中国人，而我却希望您（闵明我）能够从那儿带一点可以丰富欧洲科学的知识回来。这方面主要是他们对自然的认识（亦即自然事物的特性与作用）。我毫不怀疑，在这个领域里中国人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因为他们的传统没有中断过。”³⁷

在另一封信中莱布尼茨写道：“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中国人特别把他们在物理方面的发现传到欧洲来。”³⁸当然，莱布尼茨同时也看到了单方面介绍欧洲科学到中国可能带来的极大危险，因为他担心，一旦得到了足够的好处后，中

国的皇帝们对欧洲人就不会那么友好了。面对传教活动在中国遇到的各种困难,莱布尼茨一再提到“多婚制”是个难以克服的问题,另外还有礼仪之争以及欧洲方面的各种阻力,莱布尼茨觉得应该告诉传教士们,不要那么大方地毫无保留地将欧洲科学的秘密传授给中国。因为“当中国人掌握了我们的科学之后,他们就会把我们赶出门外,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寻求点补偿,这就是用我们的知识换取他们的知识”。³⁹莱布尼茨要求中国与欧洲在知识上交换补偿,因为他坚信中国人“在观察方面高我们一筹,而我们的强项则是理论思维,中国人应该与欧洲人交换礼物,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⁴⁰。早在罗马时(1687),莱布尼茨便在写给闵明我的信中指出:欧洲人擅长“理论思维”,就像在数学中表现的那样,而“在实践经验方面中国人却比我们强。他们的帝国数千年以来一直处于繁荣昌盛之中,古老的传统一直被保存着,而在欧洲,由于民族的频繁迁徙,这种传统已大部分丢失了。”⁴¹

根据这一看法,莱布尼茨当时就草拟了30个问题交给闵明我⁴²。收入《中国近事》的闵明我在印度果阿写的那封信就是针对这张清单而言的⁴³。与早年给米勒提出的问题相反,这次提出的问题基本上全是实际观察,特别是手工技术方面的,譬如:烟火手艺、造纸、冶炼、丝绸工艺、陶瓷技术、玻璃器皿、印刷术、采矿、武器制造、风车、海运及陆运技术等等。其中有两个问题涉及到医药与外科手术。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早在几十年前他便写信给斯皮则说他最希望的是“中国人的全部医学有一天能够传到我们这儿来。就治疗的细致、眼光的远大来说,他们肯定不亚于我们”。现在,莱布尼茨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我们的国人精于解剖与生理学,在艺术的理论原理方面同样超群,而中国人却在实践领域方面比我们强。我们不要小看实践,着眼于医学的目的,健身祛病,实践经验更重要、更有用。一句话,中国人的长处在那些可以直接被认识的领域里,诸如植物学、病理学、医疗技术等等,也就是说在对简单事物的认识及其病症的实际诊断方面。”⁴⁴

我们还是回到给闵明我提出的问题上来。有一点很明显,这里几乎没有涉及到形而上学、数学或者天文理论。莱布尼茨关心的是那些“可以使生活变得舒适,因而值得介绍到欧洲来的东西(题28)”⁴⁵。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莱布尼茨在欧洲科学与注重实践实用、强调技术的中国学问之间看到了一种互补互利的可能。机不可失,也许时不再来,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促进双方的互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闵明我是“受上帝的委托,从事一件造福于人类的事业”,“在距离遥远的民族之间建造一座相互交流的知识与技能的桥梁”⁴⁶。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莱布尼茨对文化发展的基本构思:一头是西方世界,一头是中国。按照天意的安排,两头应该动身,共同走向一个新的和谐。在这一过程中,各方应该保持自己的长处与优

点，另一面又通过取长补短而达到互补互利的阶段——这亦是“天意”。通过这一过程产生的知识便可在每一方面造福社会及人民。

这样，莱布尼茨发展了他的另一个思想：积累知识，用来促进公众福利的发展，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最好途径是建立科学院。从德国开始，通过欧洲使其遍及整个地球，因为可靠而有用的知识是人类最大的财富⁴⁷。在许多有用而可靠的知识方面，中国人远远领先于欧洲人，这在当时属于不证自明之理。每一个欧洲人只要亲眼看看中国的瓷器、中国的丝绸、中国的漆器、中国的青铜就会承认这一看法。最好的途径是交换知识，建立科学院。就中国而言，莱布尼茨曾谈到这一点，白晋曾试图成立这样的一个团体⁴⁸。

IV 在中国的传教事业

交换知识、建立科学院，本身并不是目的，亦不是单纯为了改善大众生活条件，它们起着另外的、超越自身的作用，这就是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这一点也是《中国近事》的核心问题。在这一方面，莱布尼茨认为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利玛窦以后在耶稣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科学 with 基督教信仰紧密联系，因而传教工作是通过科学宣扬信仰，以介绍科学支持信仰的传播；二是莱布尼茨从他的“互补互利”立场引申出来的，他认为西方的天启神学与中国固有的自然神学即伦理学相对亦相适应。也许是偶合，也许是天意，认识闵明我的两年前，柏应理 (Philippe Couplet) 在巴黎发表了由他编辑的《孔子——中国的哲学家》一书。同年，即 1687 年 12 月 9 日莱布尼茨即写信给黑森——莱茵区的恩斯特，说自己看到了这本书⁴⁹。这样，莱布尼茨不仅看到了来自中国的报道，也认识了儒家思想。

不过我们还是先看看知识与传教的关系：莱布尼茨一再强调认识与信仰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认为数学表达永恒真理，永恒真理通向柏拉图的理念学说，数学之路代表了通向基督教的理性之路⁵⁰。莱布尼茨在二进制及《易经》中看到了一种非常理性地接近基督教的可能：上帝是创造者，他创造了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完美的一个，并且时时维护着这个世界。这样，通过调和认识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矛盾，亦可在天启宗教中找到一个理性的结构。与这一可能相比，所有的礼仪之争便显得毫无意义，因为礼仪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成为宗教信仰中最关键的东西。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在礼仪之争日益严重的时候，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中明确地坚持大多数耶稣会士的立场，同意他们从康熙皇帝那儿“讨来的御批”，认为“祭孔之义似乎与宗教中的偶像崇拜毫无关系”⁵¹。退一步讲，即便这类活动超出了世俗的范围，含有宗教崇拜的味道，莱布尼茨亦会将其解释为无关宏旨的“外在活动”。理论方面有深一层的